



孔子研究

(2006-2-20 15:58:07)

的新人类观，要求人与人，尤其是贵族与奴隶在“人格”上的平等。作者认为，孔子思想的精华即具有民主性、科学性与至今还有生命力的进步性的东西，能够现实地为建设两个文明，振兴中华服务。

《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》，杨焕英编著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。这是一部研究介绍孔子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的著作。作者搜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，并参考和吸收了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，介绍了孔子思想在朝鲜、越南、日本、意大利、法国、德国、英国、美国、苏联的传播和影响，书后还译编了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日本、苏联五国大百科全书中“孔子”或“儒学”条目，弥补了国内这一方面的空白。

《孔子》（上下卷），姬仲鸣、周侃主编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。这是一部集孔子生平、思想学说、学说传统、文集及其学说影响和具体运用为一体，全面系统反映孔子的一套大型图书，共分六大部分：一、东方的太阳——孔子全传；二、思想的长城——孔子学说，系统地归纳了孔子哲学、伦理、政治、教育和经济思想；三、与伟人散步——孔学启示录；四、智慧的新传——儒学继承；五、东方的经典——孔学全集，收集了“五经”、“四书”；六、理想的管理——现代儒家思想与应用。

《中国儒学史》，姜林祥主编，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。全书七卷，由办学于孔子故乡曲阜师大的七位学者分头撰写，而近代卷对鸦片战争至新中国成立期间的评孔思潮有所涉及。

以上是建国后大陆的孔子研究状况。另外，1949年后，一部分新儒家代表人物和自由主义势力转移到台湾、香港等地，分别以《民主评论》、《自由中国》等刊物为载体，继续进行论辩，形成海外新儒家思潮。主要代表人物有张君勱、钱穆、徐复观、牟宗三、唐君毅等，他们固守儒家文化阵地，向国人及世界人士发出了“拯救”中国文化“慧命”的呼吁，纷纷从历史、文化、道德、伦理、宗教、哲学等领域，发挥儒家文化的精神价值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传统文化的缺陷。半个世纪以来，港台及海外华人学者相继出版了一批研究孔子的专著，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论文数量也相当可观，涉及孔子思想的各个方面。毋庸讳言，他们中存有明显的尊孔倾向，但多数学者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，对于孔子的研究是认真的、深入的，某些见解也是较为新颖的。如唐君毅的《孔子与人格世界》，牟宗三的《心体与性体》中《道之本统与孔子对本统之再建》，徐复观在《中国人性论史》第四章《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其性与天道》及《孔子德治思想的发微》，成中英的《论孔孟的正义观》、《孔子哲学中的创造性原理——论生即理与仁即生》，杜维明的《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》等等，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过重大影响。

二

以上所述，百年来评孔研孔的五个时期，情况各不相同，研究的广度深度也有差异，但又有共同的课题，即孔子学说的性质及社会作用，由此或围绕此课题引出的具体争论很多，主要有以下几项：

（一）关于真孔子和假孔子

一种观点认为，有真孔子和假孔子，应予以区分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没有真假之分。在承认有真假孔子的一派中，有的认为真假孔子之间没有什么联系；有的则认为真孔子和假孔子是辩证的统一。

“真假孔子论”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出现。当时有个叫常乃德的写信给陈独秀，申明把孔道与帝制联系在一起，是汉、宋儒士及今日之孔教会等依傍的孔教，不是真正的孔子之教，孔子之教，一坏于李斯，再坏于叔孙通，三坏于刘歆，四坏于韩愈，至唐宋之交，孔子之真训，遂无几微存于世矣。陈独秀批驳说：“足下分汉、宋儒者以及今之孔教孔道诸会之孔教，与真正孔子之教为二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。愚今所欲问者，汉唐以来诸儒，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，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？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？”强调汉唐以来诸儒与孔子本是一家。

1926年顾颉刚在《春秋时与的孔子与汉代时的孔子》一文中提出“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，即使在一个时代，也

有种种不同的孔子”，“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，战国时的孔子是圣人，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，东汉时的孔子又成了圣人，到现在又快成了君子了……我们要崇拜的，要纪念的，是这个真相的孔子！”

1934年周予同的《孔子》一文，一开始就提出，“孔子是大家都知道的圣人；然而孔子的真相，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。这原因是为什么呢？简单地说，就是真的孔子死了，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经济组织、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”。并且指出，研究孔子应该有两个方面，一方面固然要研究真的孔子，一方面也要研究假的孔子，因为假的孔子正可以衬托出真的孔子的真实性。

1978年张岂之在《真孔子与假孔子》的文章中又提出这个问题。他说：“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，许多思想家以代孔子‘立言’相标榜，有的则对孔子提出了非议，这些和孔子思想本身有什么关系？他们笔下的孔子是真孔子还是假孔子？”作者认为，在中国封建社会里，文化思想领域内的非儒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，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情况。以王充为例，他批判的对象，主要是神话的孔子和谶纬化的孔子，也可以说就是假孔子。朱熹利用和改造孔子思想，同时他们之间也有继承关系。继承和改造是辩证的统一，不能绝对地割裂开来，形象地说，朱熹笔下的孔子，既有假孔子，也有真孔子，他们仔细地研究儒家经典，进行独立审查，作出新的解释，说明他们自己才是孔子思想的真正继承者。作者认为，在“中国封建社会，文化思想领域内的真孔子和假孔子是辩证的统一，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，忽略另一方面，是不能令人信服的”。

后来匡亚明在其专著中明确地说，除了肯定孔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应有的历史地位外，更重要的则在于认真地通过批判和清理，“把真孔子和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区别开来”，后来发表的评论文章也都提出区分真孔子假孔子问题。

（二）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

这个问题，自汉代以后学者们就有不同看法，或认为六经经过孔子的手笔，甚至于认为皆为孔子所创作；或认为六经古已有之，孔子对它们未作什么加工。进入20世纪后，仍成为争论的问题之一。

一派坚持六经皆孔子所作说。晚清今文经学家廖平认为“六经，孔子一人之书”（《知圣篇》）。康有为也明确肯定“六经皆孔子所作也。汉以前之说，莫不然也。学者知六经为孔子所作，然后孔子之为大圣，为教主，范围万世而独称尊者，乃可明也。知孔子为教主，六经为孔子所作，然后知孔子拨乱世致太平之功，凡有血气者，皆曰被其殊功大德，而不可忘也”。陈焕章认为“孔子之事业，莫大于作六经。盖六经皆孔子所作也”（《孔教论》）。30年代不少学者也是这种看法。如杨幼炯认为“孔子对于千古学术上之最大贡献，即为删定六经。其本原皆出于古，而孔子删定之，笔削去取，皆有深义”。50年代熊十力《原儒》一书附录中的首篇题目就是《六经是孔子晚年定论》，认为孔子“晚年学《易》以后，其思想确突变，始作六经”。不过他认为，孔子没后，大道派学者自当世守，小康派则予以改窜之。六经本秦火后必难得，汉人传至今日六经，自是采自小康派之经本而更加窜乱。

与此对立的观点则认为《六经》与孔子有关，其代表人物为古史辨派。近代以来，随着辨伪学风的兴起，有关经书的问题受到史辨派的严格审核，有的学者就完全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，钱玄同、顾颉刚皆是此种观点。如钱玄同认为：孔子没有删述或制作六经一事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本是五部互不相干的经书，六经的配成，应当在战国末年。

介于以上两种观点之间的意见则认为孔子与六经有关，但并不十分密切。如梁启超认为，六经虽然都是旧日所有，经过孔子的手，便成为孔子的六经，所以说六经是孔子的著述，亦未为不可，但这六部经里头添上孔子的分子之多少，各不相同。他认为，礼经大约是一种官书，内中未必有孔子手笔；诗与乐，孔子的“功劳不在删诗而在正乐”，“可惜乐谱失传”；书经或许是孔子从许多古书里头删选出来，“《尚书》的文字或许还有许多经孔子润色过”；现存的《易经》，“除卦辞爻辞为孔子以前旧本外，其他皆孔子所作”；现行这部《春秋》，“完全是孔子作的，但他的底本仍因鲁史”。冯友兰在《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》一文中说：本篇的主要意思，在于证明孔子果然未曾制作或删正六经；即令有所删正，也不过如“教授老儒”之“选文选诗”。周予同认为，孔子以《礼》、《书》教弟子是有的，但没有删《诗》、《书》。孔子以礼、乐治理社会，教导个人是有的，但没有订正什么《礼经》或《乐经》。至于《易》与《春秋》，经今文学家认为是孔子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所在的著作，然而是否是孔子所作，到现在都成疑问了。

这个问题至今仍无定论，不过大多数学者认为六经是经过孔子加工整理的。

（三）孔子历代被利用的原因

一种观点认为是由于孔子自身的弱点。当然其弱点是什么，在不同人的笔下又不一样。易白沙在其《孔子平议》中说：“中国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既揭破无余，然后推论孔子以何因缘被野心家所利用，甘作滑稽之傀儡，是不能不归咎孔子之自身矣！”表现在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，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；讲学问不许问难，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；

少绝对之主张，易为人借口；重做官不重谋实，易入民贼牢笼。张东荪在《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》中认为，所以孔子被利用数千年就是因为他对于文化取维持的态度。他说：“孔子的最大缺点是在于他不讲政治制度与只讲政治精神。他的德治主义与礼治主义，由我们看来，似乎在君主上面可以实行，在民主政体上也可以实行。”“他大概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只反对君主的暴政，而不反对君主制度。后世所以能利用他，大概亦就是因为他不讲制度。”“须知制度是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第 6 页\]](#)

[\[第 7 页\]](#)

[\[第](#)

[8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